

习近平主席于当地时间 2023 年 11 月 15 日，在美国旧金山麦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 20 多项共识，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一)

近年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导致中美关系紧张。这不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也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中美关系应该怎么看？是对手，还是伙伴？习近平主席强调，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要放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人类进步展现担当。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遇到阻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速仅为 3%，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巴以冲突又烽烟再起。中美作为牵动百年变局走向的大国，唯有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才是正确选项。美国宣称大国竞争是当今时代底色、以竞争简单地定义全部中美关系，不仅是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各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的忽视，更不符合国际社会对中美强化合作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的殷切期望。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中国一贯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提出的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中国愿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的表态真诚而坦率，这种大国胸怀、视野和担当更符合历史潮流、更契合时代主题、更贴合人心所向。

要构建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既是从 50 年中美关



系历程中提炼出的经验，也是历史上大国冲突带来的启示，应该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中美建交以来，美国长期试图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克林顿政府宣称对华采取接触战略，希望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希望中国成为所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让中国在处理美国关切的国际议题中发挥作用；特朗普特别是拜登执政后，美国开始全面加强对华遏制，不断渲染中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试图与盟友“塑造”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进一步明确提出新时期中美相处的正确之道，中国坚持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处理两国关系，主动引领和塑造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此次会晤，拜登总统重申去年巴厘岛会晤时的承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怎样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可持续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旧金山会晤中美应该有新的愿景，共同努力浇筑中美关系的五根支柱。即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共同

承担大国责任、共同促进人文交流。“旧金山愿景”既是对下个阶段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是对近几个月以来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务实总结。2022 年 11 月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后，美方在落实元首共识上出现严重的“行动赤字”，采取了一些侵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恶劣言行，令双边关系遭遇新的波折。经过一年的互动博弈，美方认识到对华脱钩不现实，中美冲突必须避免，世界多数国家不愿选边站队，全球议题离不开同中国合作，因而对华释放稳定信号。此次元首会晤前，中美已成立经济、金融、商业、气候四个联合工作组，为峰会成功创造了坦率务实的对话氛围。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五个共同”，事实上是把今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以行动框架的形式确定下来。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即便分歧难以短期内消除，但中美只要按照“五个共同”的方向努力，就能延续企稳向好的发展势头，不断催生新成果。

(二)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习近平主席于当地时间 11 月 15 日晚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并发表重要演讲，60 多次提到“人民”这个词。他强

调，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这四句话意涵深刻、富有启迪，道出了两国各界人士的心声，充分表明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差异，建立友好情谊，并化作促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源头活水。

追忆往昔，从未中断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写出系列报道和《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介绍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为我们党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对外交往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战期间，中美为抗击法西斯并肩作战，飞虎队的佳话承载着两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深厚友谊；1971 年“乒乓外交”传递了两国人民友好的积极信息，“小球转动大球”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 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建立，人文交流成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中美先后进行了七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着力推动双方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妇女和青年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打造了汉语桥万人来华研修项目、“知行中国—中美青年菁英项目”、中美妇女领导者交流、中美友好城市合作等一批品

牌活动，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尽管中美人文交流一度受到冲击，但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被关上。今年以来，众多美国企业高管纷纷来华寻求扩大合作，美国科技教育界人士持续发声反对拜登政府限制滋扰正常中美人文交流的政策。根据最新民调显示，73% 的美国受访者支持同中国开展高级别外交会谈。此次元首会晤，中美两国就人文交流达成重要共识，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包括大幅增加中美客运直航航班、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优化签证申请流程等，旨在给两国人文交流提供便利，促进中美民间交往。中美多走动、多来往、多交流，不仅是两国人民做出的自主选择，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三)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强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此次元首会晤，中美再次确立正确相处之道，引领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可持续方向发展。中美两国关系攸关全球文明与价值观、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的前途命运，凸显新时代运筹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

相互尊重的中美关系应成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典范。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差异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关键是如何认识这种差异。美国往往把自己的选择定义为民主，把对方的选择定义为权威，倾向于用非此即彼的“民主制度”看世界，正是这种排他性的政治文明观扭曲了中美关系。中国则致力于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平等发展，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在对美关系中倡导尊重彼此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中国发展的最大启示就在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借鉴别国经验必须结合本国实际。美国应同中国一道在探索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进程中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符合人类对于和平与发展的追求。中美关系的状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自 2019 年以来不断警告世界“大分裂”的风险：“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建造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世界”。美国究竟是将不断强大的中国视为机遇还是看作挑战，不同的选择将导致迥异的结果。强大的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为本国、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并有助于地区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美国有责任按照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共识做出正确选择，同中国一道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更多福祉。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拉美经济“失去的十年”

袁 威

(一)

1982 年 8 月以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为标志，拉美债务危机爆发。随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相继发生还债困难，纷纷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债务危机终结了拉美国家 35 年稳定发展形成的“拉美奇迹”，拉美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

1973 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暴涨，使国际市场充斥着过剩的“石油美元”，也推高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由 1972 年的 3.2% 上升到 1974 年的 11%，1975 年维持在 9.1%。为了控制通胀，西方央行开启了加息步伐，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1972 年的均值在 4.5%，1974 年最高超过 13%，利率上行导致西方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美国 1974 年、1975 年连续两年陷入负增长。

在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之后，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重启宽松政策，从 1975 年到 1977 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均值大幅回落至 5.5% 左右，M2（广义货币）增速超过 10%，而通货膨胀率再次开始攀升。1980 年，美、英、日 CPI 分别上升至 13.5%、17.97%、7.70%，其中英、日通胀水平低于第一轮石油危机，美国则高于第一轮石油危机。总体上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美联储货币政策总体宽松，借贷成本较低，因此拉美国家在这一阶段债务水平快速增长，1970 年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三国的平均外债余额为 63 亿美元，而到 1980 年已猛增至 523 亿美元，提高了 730%。

1979 年 8 月，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面对通胀这匹始终无法驯服的脱缰野马，沃尔克一改常态对通胀采取“零容忍”政策，实行了激进的紧缩政策，收紧货币供给，上调了折现利率，1980 年 12 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最高升至 22%。拉美国家举债多为浮动利率，大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攀升，借贷成本骤升，债务负担加剧，只能被动维

持赤字财政和扩张性货币政策。

1981 年，巴西的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就达 7.81%，存量达 2500 亿美元；阿根廷公共债务存量高达 GDP 的一半以上。巴西和阿根廷政府都不得不依靠大量发行货币弥补财政赤字，这一做法直接引发恶性通胀。1982 年，拉美十四国的平均通胀率就高达 71.45%。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拉美国家企业和私人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资金短缺情况，对外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样是 1982 年，拉美国家外债总额已高达 3313 亿美元，占该地区 GDP 一半以上，相当于当年出口额 875 亿美元的 3.8 倍，负债率高达 331%，偿债率高达 41%。

1982 年 8 月 12 日，时任墨西哥财长席尔瓦·埃尔索格向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报“墨西哥几乎耗尽全部外汇储备，再也无力偿还到期的债务本息”。消息一出，举世震惊，拉美债务危机爆发。随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也相继发生还债困难，纷纷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拉美经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

1982 年底，美国等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拉美债务危机是暂时的流动性危机，因此以注入流动性和债务展期掉期的方式进行救援，暂时缓解了债务国流动性压力，但危机并为得到真正解决。从 1985 开始，美国先后提出了贝克计划、布雷迪计划，通过提供优惠贷款、债务转换、债务资本化等措施缓解债务压力，这些方案对拉美债务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减债程度有限、资金来源不明确，均未起到根治效果。

(二)

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迅速席卷拉美主要国家，资本加速流出，货币大幅贬值。美联储高利率政策下，大量国际资金从拉美地区流出。1982 年末，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三国的

外汇储备均值就从年初的 68 亿美元大幅降至 34 亿美元，降幅高达 50%。拉美国家汇率制度随即从“盯住美元汇率”转向“爬行盯住汇率”，原先普遍高估的汇率大幅下调。例如，1980 年美元兑墨西哥比索汇率为 0.0228，1990 年已超过 2.7，美元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从 1980 年到 1982 年，期货价格指数跌幅超过 30%，拉美国家出口收入锐减，偿债能力被极大破坏。

严重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等问题接踵而来。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整个 80 年代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 1.2%，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仅为 0.4%。此外，通胀率持续攀高，从 1982 年到 1983 年，拉美十四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从 71.45% 提高到 82.77%，随后更是进入到严重通胀甚至恶性通胀通道。例如，1990 年阿根廷和巴西的 CPI 增速均超过 2000%。据统计，危机期间拉美国家失业率平均高达 15%，部分国家甚至超过 20%；地区贫困状况严重，地区贫困率由 1980 年的 40.5% 升至 1990 年的 48.3%，创历史最高纪录。

拉美债务危机也对欧美商业银行造成了沉痛的打击。欧美商业银行坚信国家不会破产，向拉美国家提供了大量贷款，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美商业银行出现了大量无法回收的债务，损失惨重，例如以花旗银行为首的九家美国银行对拉美国家的贷款就占其总资本的 176.5%。随着拉美债务危机的久拖不决，这些商业银行也滑向了危机。不过，由于拉美地区经济落后，并且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所以危机的对外传导相对有限，主

要集中于商业银行领域。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源自拉美国家内部发展结构性缺陷，也深受复杂而不利的外部因素的影响，为我们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提供了重要启示。

保持国际收支盈余或平衡，合理管控外债规模。要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稳步提升外汇市场成熟度和理性程度。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健发展，夯实国际收支保持平衡的基本盘。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实现跨境资本流动全面监测，合理管控外债规模，建好“防火墙”，避免资本短时间内大进大出。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发挥好财政政策在结构性调控方面的优势，通过税收、投资等手段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帮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实现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营造稳健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发挥好结构引导作用，支持财政政策产生效果。健全外部风险应对的政策部门协调机制，明确各级政府风险处置中的具体责任和分类分级响应参与流程，合理构建压力测试和危机状态的应对预案。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守住金融风险底线。要做好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持续加大金融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着力为实体经济稳定增长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三)

要集中于商业银行领域。

（上接 1 版）“两个结合”为理论强党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使我们能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和推动理论创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拥有了推进理论创新的伟大认识工具。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结合起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同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结合起来，产生出中国人独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产生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个结合”打开了理论思维空间，使我们在每一个实践领域都能够推进理论创新。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明中有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和“商量”的施政要求以及“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我们推进改革开放，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念，强调形成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第二个结合”掌握

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理论

理论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用于理论的三个方面。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是理论创新的结晶，又是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改造中华民族文化沃壤的基础上，真正成为中国的。这个“中国的”既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

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是辩证的契合，是相互促进的契合，更是矛盾运动中的契合。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意味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科学全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刻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的思想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还意味着：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系统。习近平总书记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就告诉我们应当更多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等方面去把握中国的实际。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理论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从 100 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等，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以强大的精神和文化力量。从 100 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还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党提出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新时代，我们党创立了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